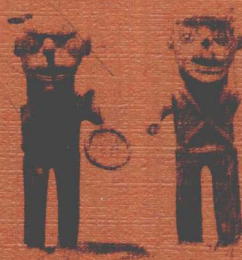


文学与人类学文库

王璐◎著

文学与 人类学之间

——20世纪上半叶西南
民族志表述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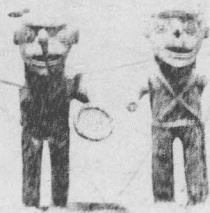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文学与人类学文库

王璐◎著

文学与 人类学之间

——20世纪上半叶西南
民族志表述反思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与人类学之间: 20 世纪上半叶西南民族志表述反思/王璐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8

(文学与人类学文库)

ISBN 978-7-5203-0319-4

I. ①文… II. ①王… III. ①民族志—研究—西南地区—民国
IV. ①K28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9994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李 莉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9.5
插 页 2
字 数 358 千字
定 价 11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with 理论假设开始被学界重新审视，民族志的传统范式也逐渐受到质疑，被认为出现了普遍和深刻的“表述危机”^①。有学者甚至预言“科学民族志”将被淘汰，“实验民族志”会成为下一个时期的主流。^② 面对这种挑战，有必要总结民族志自近代以来在中国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由此推进学人的相关认知，从而为民族志的未来历程重定根脉。正因为如此，以学术史反思的视野来读王璐专著《文学与人类学之间——20 世纪上半叶西南民族志表述反思》，无疑会有多重的意义。

在我看来，由王著引出的话题，至少包括下列几个方面。

问题一：民族志对于推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何在

作为一个特定的外来词语，“民族志”对应的是 ethnography。该词在早期也译为“人种志”。所以我们首先要面对的是汉语与西语（目前以英语为主）两个语言世界的动态对话。其中，“志”的含义在汉语世界古已有之；“民族”和“人种”则实为外来。在汉语的书

① 参见乔治·E. 马尔库斯、米卡尔·M. J. 费彻尔编著《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王铭铭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版。

② 参见克利福德、马库斯编著《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等译，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



写传统里，作为次一级的文献类型，“志”一方面与地位高贵、代表官修话语的“史”相对，以陪衬、对照和充实正史的典范意义；另一方面又在王权正史的映照下通过对地方、异族或次等级文化事象的记事书写，完成“大一统”结构中对边缘类型的教化表述。这时的“志”，可称为汉语文类中的“次文类”“准历史”。这样，近代以后的一些中国学人用“民族志”（或“人种志”）翻译西语的 ethnography，一开始就包含了对具有从属地位的认定和暗示。结合西方的学术语境来看，这样的翻译也符合该词与 History 的对照和区分。因为与 History 相比，“志”的基本特征是不仅缺乏进步（进化）而且没有自觉，因而只能是扁平的、被动的，不能称为“史”。正是以此为前提，到了后殖民时代，才会有学者撰写专著，特别揭示不同体裁后面的分类鸿沟，那就是：“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参见 Eric Wolff,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1982）。

所以说近代以后引进汉语世界的“民族志”，作为越来越广泛使用的文类和体裁乃至社会科学的普遍范式，不仅关涉书写倾向和话语政治，而且关涉文化表述后面不同思想谱系的沿袭命运。因此，我认为目前需要反思的第一个问题，是认真梳理和分析在英、汉及其他不同的语言世界中，“民族志”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功能，至今发生了如何的演变。

问题二：怎么看待民族志遭遇的“表述危机”

需要反思的第二个问题是一百多年来的民族志实践及其文化后果。民族志写作的特征大都被概括为从“理论预设”到“田野考察”再到“实证写作”的“科学”过程。于是，汉语的民族“志”就成了动词，代表一种系统的实践行为。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志就是“志



民族”，也就是通过“志”的撰写，使对象民族化、文本化、方志化（人种化）。这样的结果，虽然在西方列强的殖民式书写里因每每带有“原始”“落后”等判断而伴生着“边缘化”或“污名化”特征，但在现代中国则是使众多以往被视为另类的“蛮夷”地位得到提升，从而使国家认定的各个民族都通过堂堂正正、独立成章的民族志在多元对等的民族之林里与传统的主流人群并列。在这样的历史前提下，如果说有“表述危机”的话，最大的危机倒不是民族志的文类或表述本身，而在于表述主体的缺失或错位。

西方殖民时代以来的民族志生产几乎都是由殖民者代言。这样，非西方世界的人民，尤其是那些没有文字更没有文化表达权的弱小族群，几乎全都成了失语的对象。在这种结构中的民族志写作及其产品，尽管都冠以了各个族群的名称，实质上却都只是被表述的他者而已。因此我认为，“表述危机”首先要解决的还不在于争论“民族志”是科学还是艺术，而是如何让其从单一的“被表述”或外来式的“志民族”困境中摆脱出来，回归到文化的自表述之中，让每一群体的书写主体得到确认，从而完成主位的“自我民族志”。这一点，国外如此，中国也不例外。

问题三：该如何构建本土人类学叙事范式

“民族志”这一术语来自西方，却不等于汉语世界没有“志民族”的传统。从司马迁的《西南夷列传》《礼记·王制》《尚书·禹贡》及《山海经》等对“一点四方”的等级式描写和对“华夷之辨”的漫长区分以来，汉语世界从未停止过对不同人群的分类、定性和评述。因此，到了由“西学东渐”导致的科学话语成为主宰的今天，本土化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在于推翻 ethnography 的统治、把“民族志”



清除出汉语，让古代的“蛮夷列传”文类死灰复燃，直至重构普天统一的华夏中心；或者借助中国的崛起，输出大批民族志愿者到世界各地去，仿造当年西方列强的殖民做法，把全世界的“他者”特别是西方强国都由我们“志民族”一番，用华夏人的眼光和方式全再改写一回。那能否做得到呢？难说。即便做到了，也是可笑的。

那对于西方传来的民族志有没有需要反思、对话和超越的问题呢？当然有。除了前面提到的主体确立外，我认为按关联的层次来说，本土化的民族志写作还需要超越的第一是用语、第二是分类、第三是阐释。

在用语问题层面，需要尽量减除诸如“图腾”“萨满”“多声部”直至“宗教”“艺术”“文化”等这类有限概念和空泛“大词”的人为化普涉，还原和再现各地拥有的自身用语，无论叫“东巴”“招魂”“多嘎”……还是其他什么都行。

分类问题同样重要。在这点上，民族志作者们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仅以自己“客位”的知识标准出发，对被表述文化体系的自在结构随意分类，也不要轻易使用“进步”“落后”乃至“科学”“愚昧”这样的话语加以判定。

最后，到了阐释环节，民族志作品当然躲不开文化阐发，也就是对被书写对象的编码进行解码。但是这样做的前提首先要求从主人的视角出发，从“他们”的眼中看世界，而不是相反。更不是把外来作者的想法强加给对方，甚至是借助自我的话语权力实施文化改写和“异端”教化。从如今已深陷于工业和城市牢笼的人类处境来看，随意改写和教化的后果极可能是先从表述的层面毁掉人类文化和价值多样性，接着再在现实生存的意义上直接葬送逃离毁灭的潜在生机。

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志”问题所关涉的不仅是人类学学理，更



关涉更大范围的人类文化、历史和政治。在过去一百多年中，地球上的人们通过“民族志”的大量涌现逐步汇齐了人类差异方面的世界档案。如今，如出现超越式的“民族志”的话，则可能获得对人类一致性的体认和相通，从而从整体上走出社会和生态的陷阱。实现这目标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得把“民族志”从日益狭隘的“地方志”和“国族志”局限中摆脱出来，重新回归为整体性的“人类志”（译成英文，就叫 humanography）。回归的重点在于解决“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问题，就是一方面顾及地方的全球属性，另一方面关注全球的地方特征。

这时，人类学的关注对象就不再是分散对立的人群，而是恢复到整体人类；田野考察也不仅止于个别孤立的村庄、城镇，而是生物圈，亦即包括人类和万物在内的统一生态环境。

由此观之，王璐的著作虽仅以 20 世纪上半叶为例，所举的事例也只限于西南一隅，然其视野已同学术史的纵横脉络密切关联，讨论的问题也已与笔者的上述思考相互对应。作为王璐博士的论文指导者之一，笔者为她的辛勤笔耕及厚重成果倍感欣慰。本文原系回答期刊编者的访谈旧作，喜闻王著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特此翻检出来加工润色，是为序。

徐新建

2015 年 6 月 26 日

于成都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中西语境下的民族志	29
第一节 从 ethnography 到民族志	30
第二节 古代表述与近代认知	55
第二章 西南民族志概述	72
第一节 特定时空下的西南民族调查	72
第二节 文本类型与体例	96
第三章 汉语民族志溯源：我族与他族	106
第一节 “志”体表述与中原“史”观	108
第二节 溯源：由“蛮夷”到“同胞”	118
第三节 历史·民族史·民族志	137
第四节 “科学民族志”与溯源研究	151



第四章 夷汉分类：区分与认同	163
第一节 地理交通：分类的起点	165
第二节 分类层级及表述	188
第三节 西南民族分类的相关讨论	216
第五章 文化表述：“落后”边胞与“现代”国民	236
第一节 差异与认同	237
第二节 初民社会与原始信仰	242
第三节 传统服饰与现代“性”观念	278
第六章 民族志与“观西南”	322
第一节 新西南：从新文体到新观念	323
第二节 观西南：民族记录与文本表述	334
第三节 “化”西南：从教化到同化	366
结 论	377
附录1 民国期刊部分相关论文文献	387
附录2 相关访谈学者	431
参考文献	432
后 记	458

导 论

一 西南视野与中国研究

2010年，第五届中国文学人类学会以“表述中国文化：多元族群与多重视角”为主题。会议发起人将中华各民族的文学与文化作为完整共同体的有机部分来考察，倡导揭示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多样性，以及地方和族群文化间彼此关联的多样性视角。会议印发的文件“宗旨”指出：以汉文书写为载体的中国传统正史习惯于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叙事，多族群的边缘视角遭到长久的蔑视和忽略，因此需要重新强调：

第一，打破三千年来占据统治地位的王朝叙事范型，从多元共生与融合互动的族群视角和边缘文化视角，重新寻找“表述中国文化”（presenting Chinese culture or writing cultures within China）和中国经验的学术契机；

第二，彰显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的表述意义，探讨其对重建新多元视角的中国文化观的资源价值。^①

^① 参见徐新建、叶舒宪、彭兆荣《表述“中国文化”：多元族群与多重视角》，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五届年会，广西，2010年6月。



对“表述中国”单一模式的突破，晚清至民国是关键所在。^① 在这段时期里，不仅中国被认为是多元的，而且表述中国的声音也是多元的。汉语世界认识中国的基本分野在当时特别凸显，具体来讲，一类是以民国时期顾颉刚等人在国家危亡之下强调“国族”认同的一元中国论说，另一类是民国时即开始关注的西南研究、西北研究、东南研究等以区域为单位的多元中国论说。当今学界，一元与多元，中心与边缘，同质与异质，这种关于中国的话题模式依然出现在各种学科的相关讨论中，至今仍有探讨的空间。本书关注的起点即为民国时期。

2011年，葛兆光出版了《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一书。书中就如何研究“中国”的问题，再次肯定了傅斯年在1928年强调“虏学”研究的重要。

所谓“虏学”，用当时的话说，即指“四裔”之学。^② 那时，傅斯年遗憾学界的研究落后于西方汉学，因此设想推动中国研究“将来一步一步西去，到中央亚细亚”，从敦煌、安西到中亚，重心在西北。^③ 傅斯年对于当时传统学术研究的贡献是很明显的。不过，葛兆光认为，要重新认识中国，从国际视野的角度说，还须从“虏学”的眼光，扩展至“从周边看中国”^④，而作为“虏学”的补充与延伸，

① 徐新建：《表述中国：帝国和民国的历史叙事》，《社会科学家》2012年第2期。

② 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工作旨趣》中提到“虏学”：如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问题，在欧洲人却施格外的注意。说句笑话，假如中国学是汉学，为此学者是汉学家，则西洋人治这些匈奴以来的问题岂不是虏学，治这学者岂不是虏学家吗？然而也许汉学之发达有些地方正借重虏学呢！见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工作旨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中研院”1928年版。

③ 这是傅斯年设想历史语言研究所求新材料的第二步。第一步是沿平汉路，安阳至易州、邯郸等故都，这是容易得到材料的地方。

④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86—295页。



葛氏所言的“周边”，是1938年胡适在英文论文《近年来所发现有关中国历史的新资料》中所提到的“日本朝鲜所存中国史料”，即中国之“东边”的一些国家，葛氏认为，“它将成为学术‘新的增长点’”^①。而在葛氏的书中，很少提及中国西南区域，即使在肯定1928年成立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学术典范和学术重镇之意义的总结中，也未提及当时关于西南的调查与研究。^②

就在《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一书出版的同年，西南学者徐新建，在普洱师范学院举办的“誓言不朽同心永结”讨论会上，以“诏书”和“盟誓”两组较为“边缘”的事例为起点，说明了现代中国之多元历史的由来和特征。在如何认识中国问题上，再次重申了“从西南认识中国”的重要视角。^③

往前追溯，2005年，徐新建就从族群地理与生态史学的角度，强调了“藏彝走廊”跨越行省史观审视中国文化历史的意义；^④可巧的是，葛兆光也在同年同一期刊物上，以“中国早早地就具有了文明的同一性”作为基点，质疑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中国“虚假同一性”论说。^⑤上述二位学者的观点与讨论代表了认识中国所侧重的不同视角。

在民国时期民族志文本中，已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民族识别工程中，西南又被识别为最多族群的地区

①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85页。

② 同上书，第273—285页。

③ 徐新建：《从“普洱誓盟”看现代中国的“民族表述”》，《民族文学研究》2012年第4期。

④ 徐新建：《族群地理与生态史学：从“藏彝走廊”谈起》，《二十一世纪》（香港）2005年8月号，第104—114页。

⑤ 葛兆光：《重建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还是在历史中理解民族国家？》，《二十一世纪》（香港）2005年8月号。



(官方识别为 25 个民族), 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中, 西南也呈现出另一种类型的多样化, 历史学、地理学、宗教学、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蜂拥而入, 使得西南研究成为显学。20 世纪 90 年代“西南研究”被一批西南学者以及研究西南的学者再次强调, 并提出“西南学派”^①, 然而, 西南研究还是未竟的事业, 学术界仍有探索的空间。

作为独特的文化区域, 西南引人关注与西学东渐的人类学、民族学关系密切。但新中国成立后, 人类学作为“资产阶级学科”被取消 27 年 (1952—1979 年), 仅保留了民族学研究处理中国的民族问题, 而今, 从历史、地理、政治、文化、考古等方面进行的西南研究成果已经不少 (详见综述部分), 但并未有从民族志的视角进行整体分析。关于各单一学科分类研究的局限性问题, 埃里克·沃尔夫 (Eric Wolf) 有过深刻的反思。他在《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一书中批评了政治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在研究中如何忽略了“人类世界是一个由诸多彼此关联的过程组成的复合体和整体”这一事实。“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科学家都无一例外地把独立的民族当作基本分析框架。社会学继续把世界分割成彼此独立的社会。”^② 人类学是否就能达到最周全的研究呢? 沃尔夫也谈到人类学的功能主义, 他说, 人类学家对单个群体的“所思所想”的研究通常用功能主义法则, 实质上, 他们的兴趣是探究意义的地方微观世界, 在他们的想象中, 他们是自成一体的系统。^③ 虽然人类学的功能主义被沃尔夫质疑, 但民族志进入中国后, 与同时期的西方世界相比, 发挥了不同

① 徐新建:《西南研究论》, 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

② [美] 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导论, 赵丙祥、刘传珠、杨玉静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③ 同上书, 第 23 页。



的作用。同时翻检当时的西南调查,发现其文本体例及内容远非功能主义所能涵盖,文本在体例上显示出中西结合的特征,在内容中体现出历史与现实的关联对照。因此,选择民族志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可以相对全面地呈现西南文化的丰富性与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因为民族志本身具有这样的优势:民族志自身所具有整体观的认识论,至少可以比较有效地纠正以前被僵化、扭曲、刻板的文化表述。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志进入西南可以超越以前过度概括化的西南描写,从而将西南作为人类世界的“复合体”和“整体”加以观照(虽然当时的西南民族志并没有达到如此目的,另当别论)。

回到民国,当时的两种中国模式即“一元中国”与“多元中国”论说是否并行?王明珂等学者已有回应。王认为,无论从历史还是考古,当时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西南民族的调查,实质是在“国族主义”下,再造了一次“华夏边缘”。^①王明珂从“历史创造者”的角度对中国早期的民族调查作了深入的总结。然而,就具体记录而言,多元中国(文化多样性)同样体现在民国调查的表述中,虽然有的充满了文学似的想象与趣味。受科学主义影响,其想象与趣味又常常被科学话语置换。可以说,这一时期,是表述中国的传统话语方式与现代话语方式大混杂、大融合的时期。对民族调查而言,又是以现代科学话语规范其表述方式的时期。因此,本书想将研究文本扩大,以广义民族志文本作为讨论对象,并适当列入被调查对象的自我表述进行参照对比,以西南调查为重点,来讨论当时的中国表述样态。

本书选择中国早期民族志的西南书写文本进行分析,重点在于

^① 参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十一章“近代华夏边缘再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探讨在中华民国建设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所谓科学理念下,如何利用现代民族学、人类学知识去发现和表述西南的地方文化与少数民族,以及这种表述背后所蕴含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本书将纳入一些被表述对象的言论进行参照分析,以更深入地探讨其时关于中国民族的多元表述真实性。在本书的分析中,涉及几个关键的话题。

二 民国·西南·民族志

民国、西南、民族志,是本书研究内容中的三个关键词,其在本书研究中的作用及意义如下。

民国。20 世纪上半叶有一个关键词是“民国”。“民国”一词含义非常丰富,至今学界论说不休。至少有三点是本书需强调的。一是民国意味着中国从“天下”到“国家”的重要转变。^① 民国是主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一个新事物,民国也是一套新话语产生的时代,这个时代出现了现代教育体系、现代学术制度及现代社会思想,民族志的出现与之密切相关。如果把司马迁时代看作是前民族志时代,本研究中的民国可以看成是对地方、人群、文化表述的民族志时代,这一时期,可称之为中原王朝进入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社会转型期,其学术转型的特点之一,表现在知识分子对一个地方、人群、文化的描述方式发生了文本转移,并体现了他们对地方性知识认知的新变化。作为现代性知识生产大潮的重要支流,民族志也成为国家建构的重要工具。二是民国学术的多元化。民国时期特别强调的民本思想是本书

^① [美]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7 页。



关注的重点。当“目光向下的革命”^①推进以后，少数的、边缘的“蛮夷”开始被学界注视，他们也获得了被主流社会关注的可能，所以民族志无论是以何种“面目”进入中国，在何种程度上被“本土”使用，但在民国思想史上都是值得肯定的。历来少数民族在正史中都是作为中原汉族的陪衬，甚至被以妖魔化的、污名化的他者形象，裹挟在列传、方志等补充性历史文本里。司马迁以来的书写系统中，各个边缘族群虽被提及，但其文本中表现出的帝王中心意识还是相当明显。民族志以另一种学术观念参与族群叙事，对传统中原中心的学术观也带来了审视和冲击，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学术的多元，因为至少从事民族调查的学者，原则上是认同民主、平等思想的，四方蛮夷的他称，也第一次被转换为“边疆同胞”；同时民族调查本身，原则上也是强调科学与客观原则的。三是民国的多元历史中，国民政府的官方话语对知识分子的民族调查产生了重要影响，学术与政治的纠葛，是其时民族调查的主要特点。民国的新知识分子群体在民族调查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在本书里，民国作为一个历史的表述单位，还需要回溯至1905年那场“静悄悄的革命”，即科举制度的废除，因为特定的知识群体由此产生。许纪霖认为，科举是保证王朝一体化的最重要的方式。^② 中华帝国的疆域极其辽阔，而当时的技术手段又相当落后，因此，如何对广土众民实施有效的统治，使之形成共同的天下意识和王朝意识，没有科举显然是无法实现的，科举发挥了王朝一体化的整合功能。1905年之后呢？科举制的废除，使得精英开始多元化了，不再往国家流动，而是流落到民间，国家与精英的关系在1905

① “眼光向下的革命”是借用赵世瑜的观点。见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 许纪霖等：《“科举废除百年祭”学术笔谈》，《文汇报》2010年11月9日。